明代荆州籍进士略考（九）

□ 余大中

赵士贤

赵士贤，其家谱作赵仕贤，字维屏，号南桥，生卒年不详，湖广石首人，弘治六年（1493年）二甲第十三名进士。同科状元毛澄，榜眼徐穆，探花罗钦顺，同科二甲赐进士出身共九十名，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共二百零五名。赵氏族谱主编赵锋城撰文提供的资料显示，赵士贤的二弟赵士俊，赵士贤的独生儿子赵中道，皆为进士，在石首传为美谈。

文献记载，赵士贤初为翰林院庶吉士，授户科给事中，升兵科都给事中。赵士贤曾经上疏，提出请求选帅练兵、令勋戚子弟入国学、禁道士为太常正官等对策建议，得到朝廷采纳。

明武宗朱厚照正德初年，宦官刘瑾“八虎”集团擅权乱政，赵士贤也是刘瑾打击处理的对象，曾经被削去官职，回到老家石首闲居。正德五年（1510年），刘瑾谋反之事败露，被凌迟处死。此后，赵士贤得以重返官场，担任江西布政司左参政。赵士贤勤政廉政、公正公平，在官场和民间口碑甚佳，最终因病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去世。

赵士俊

赵士俊，家谱写作赵仕俊，字柱翰，号长垣，生卒年不详，湖广石首人，弘治九年（1496年）三甲第二十五名进士。同科状元朱希周，官至南京吏部尚书。榜眼王瓒，官至礼部左侍郎，追赠礼部尚书。探花陈澜，参修《大明会典》，升翰林院修撰，三十五岁时因病去世。同科二甲赐进士出身共九十五名，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共二百名。

赵氏族谱主编赵锋城撰文提供的资料显示，赵士俊与赵士贤是亲兄弟，先后中进士，在石首传为美谈。赵士俊、赵士贤的父亲赵敌，字楚山，号省斋，天顺己卯（1459年）举人，拔贡。生子四：赵士贤、赵士能、赵士俊、赵士伟。赵士贤是其长子，赵士俊是其第三子。

文献记载，赵士俊中第后担任长垣县（今属河南）知县。明代长垣县隶属于大名府开城，赵士俊居官清廉，口碑甚佳，后升任工科给事中，主要职责是检验军器局所造军器、监收解到的弓箭弦条、营建监工、按季稽核工部宝源局铸钱工料及钱数、查验工部修理仓账目、审核各部分竹木局账目等。

赵中道

赵中道，字从之，号三田，生卒年不详，湖广石首人，弘治十八年（1505年）三甲第九十五名进士。同科状元顾鼎臣，历官修撰、左谕德、礼部右侍郎、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，官至内阁首辅。榜眼董玘，官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，追赠礼部尚书。探花谢丕，曾任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掌院事，后远离官场。同科二甲赐进士出身共九十五名，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共二百零五名。

赵氏族谱主编赵锋城撰文提供的资料显示，赵中道是赵士贤的独生儿子，赵士俊的侄子，兄弟父子叔侄三人皆为进士，十分荣光，传颂至今。

文献记载，赵中道中第后，担任翰林院编修，后来担任江浙海道副使。明代在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山东等沿海地区设立巡海道，主管海防事务，兼及外贸和外交。赵中道还担任过四川提学副使，相当于主管教育工作的副职。后来担任户科给事中，负责稽核财赋、注销户部文卷之事。赵中道每每上疏皆为直言，是一个正直无私、敢于斗争的监察官员。

郑镐

郑镐（1370年—？），湖广石首人，父亲郑阳，母亲李氏，其兄郑铉曾任石首教谕，娶妻陈氏。郑镐湖广乡试举人第六名，会试第三十二名。建文二年（1400年）三甲第三十一名进士。郑镐与正统年间首辅杨溥既是同乡，又是建文元年（1399年）同科举人和建文二年（1400年）同年进士。建文元年（1399年），石首同科共有六人中举，次年杨溥、郑镐又同登进士榜，实属难得。

郑氏族谱主编郑明灯撰文提供的资料显示，郑镐的会试作文《书义》入选优秀考卷汇编。文曰：“惟王不迩声色，不殖货利。德懋懋官，功懋懋赏。用人唯己，改过不吝。克宽克仁，彰信兆民。”初考官朱拾遗批：“词理明畅”。考试官高少卿批：“此卷七篇皆平正，四书义尤整洁。”考试官董学士批：“三场可取”。

同科状元胡广，字光大，号晃庵，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，授翰林院修撰，赐名靖。“靖难”之后，擢翰林院侍讲，不久进入内阁，改任翰林院侍读，恢复本名。胡广官至文渊阁大学士、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。去世后追赠资善大夫、礼部尚书，追谥文穆，史上文臣获得谥号就是始于胡广。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，加赠荣禄大夫、太子少师。同科榜眼王艮、探花李贯，二甲赐进士出身共三十七名，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共七十名。

郑宗载

郑宗载，字本厚，生卒年不详，湖广石首人，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年）三甲第七十九名进士。明宪宗朱见深在位二十三年，共举办科举考试八次，包括成化二年（1466年）丙戌科、成化五年（1469年）己丑科、成化八年（1472年）壬辰科、成化十一年（1475年）乙未科、成化十四年（1478年）戊戌科、成化十七年（1481年）辛丑科、成化二十年（1484年）甲辰科。郑宗载参加的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年）丁未科是最后一次。同科状元费宏，授翰林院修撰，历任左春坊左赞善、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、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、礼部左侍郎、礼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、太子太保、武英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，为官四朝，三入内阁，官至内阁首辅，先后辅佐明武宗朱厚照、明世宗朱厚熜近十年。同科榜眼刘春官至礼部尚书、太子太保。同科探花涂瑞。同科二甲赐进士出身共一百一十名，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共二百三十八名。

郑氏族谱主编郑明灯撰文提供的资料显示，郑宗载中进士后，选庶吉士，授翰林院检讨，在史馆奏复建文革除年号，文中写道：“帝王受命，启万世之鸿规；史氏载笔，昭一代之大统。虽言动起居、游观燕几之细，录焉必详，而况继世承统，纲常所系者乎。”“臣历观前史，晋怀、愍有永熙、建兴之号，宋徽、钦有建中、靖康之号，又何辞以解夫诏诸将无使有杀叔父之建文乎？”“臣忝居馆职，诚有昭是非，垂劝戒之责。与其贻讥于后世，而使皇上有盛德之累，孰若披陈于今日，而使千古无遗议之议乎？”但不报不允。郑宗载性情刚介，“不阿权贵。给假省亲，一贫如洗。修家乘成，力不能梓。”时人评价他：“有官居翰林，无力镌家乘。”后来，以德王府长史出任九江知府。

二十四节气与荆州习俗㉓

小寒：腊梅初绽年味浓

□ 张卫平

雪尽南坡雁北飞，草根春意胜春晖。
曲江永日无人到，独绕寒池又独归。

唐代诗人裴夷直《穷冬曲江闲步》一诗中，描绘了小寒时节寒冬凛冽之时，春意随着北飞的大雁悄然显现，逼近冬天的尾巴。此时，人们的心情也随着渐渐浓郁的年味而温暖。

“小寒，十二月节。”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，“月初寒尚小，故云，月半则大矣”。正所谓，“虽曰小，实为最”。气象资料显示，小寒是一年中最冷的节气。因此，民间有着“小寒胜大寒，常见不稀罕”之说。对此，南京气象学院教授冯秀藻的解读是，“寒是寒冷的意思，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。小寒是气候开始寒冷，但还没有到最冷的时候，因此称为小寒”。小寒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23个节气，也是冬季的第5个节气，一般在每年的公历1月5日与7日。其实，小寒与大寒、小暑、大暑一样，都是属于人文节气，“是人们念祖、劳动和自身的冷热感知，是观察自我，以人自身为参照而设置的节气”。

对于小寒三候，古人是这样表述的，“一候雁北乡，二候鹊始巢，三候雉始鸲”。动物与禽鸟，对于气候的感知非常敏感，比人类更是要强上千百倍。作为极寒天气标志的小寒与大寒，人类唯一感觉的是“寒冷之极”，但禽鸟感知到的则是春天的气息。比如，在二十四节气中大雁一共出现了三次，在极寒天气到来之前，大雁敏锐地感知到阴阳即将发生根本性逆转，阳气即将回升。于是，大雁开始从越冬的南方向北飞，要回到故乡去迎接春天的到来。大雁在一年四季中，用三次漫长的旅途，经历了南归与北归，完成了生命中的又一次四季轮回。这，就是小寒三候中的第一候“雁北乡”。

同样，喜鹊与野鸡也与大雁一样，在“小寒”到来之际，感知到了阳气，于是喜鹊开始修筑爱巢，野鸡开始“叫春”，都准备在春暖花开的日子繁育自己的后代。可见，禽鸟与人类一样，在历经了漫长的严冬之后，也在呼唤春天的归来。

小寒节气一过，就是腊月了。就今年来看，小寒前五天属冬月，后十天属腊月。俗话说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腊八，就是农历十二月初八，又称之为腊日和腊八节。几千年前，古人有着在年末时用猎物祭祀祖先、神灵和祈求丰收、吉祥的传统，是腊月里最为重要的一个节日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说：“天子大腊八。”可见，先秦汉时期就有着腊祭的习俗。不过，周朝的“大腊”是在农历十月，称之为“十月朔”或“十月朝”。后来，楚人对“大蜡”进行了改造，注入了楚文化的因子。《湖北民俗志》里记载：“古代行腊祭并无固定日期”，荆楚地区在“南北朝时，腊日为阴历十二月初八日，阴历十二月俗称‘腊月’，故为‘腊八节’”。相传，农历十二月初八是佛祖得道的日子，腊八节又称“成道节”。荆州民间除了腊月初八到寺庙里去吃腊八粥，更多的还是自己在家中煮腊八粥。

“吃了腊八饭，就把年来办。”荆州民间习俗，腊月节令饮食活动是一年中最为丰盛的一个月。从喝腊八粥开始，人们接着要扫房、请香、祭灶、封印、写春联、办年货、过小年，直到除夕夜。所以，喝腊八粥，揭开了“过年”序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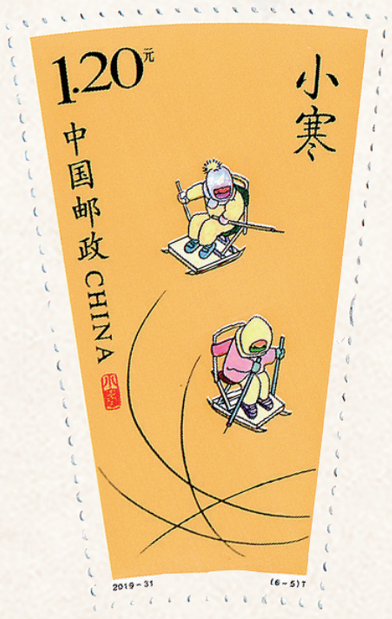
腊八粥，又叫“五味粥”“七宝粥”和“八宝粥”。《燕京岁时记·腊八粥》记载：“腊八粥者，用黄米、白米、江米、小米、菱角米、栗子、红豇豆、去皮枣泥等，开水煮熟，外用染红桃仁、杏仁、瓜子、花生、榛穰、松子及白糖、红糖、葡萄，以作点染。”只是，这个腊八粥，可能源于荆楚习俗。楚人认为，寒冬腊月，喝赤豆粥可以驱避瘟鬼。对此，清光绪《荆州府志》及《续修江陵县志》都记载有初八日“寺院以豆果杂米为糜，供而食，曰腊八粥”。战国时期，荆楚的腊八粥用料单一，仅仅只是用大米和赤豆煮粥。赤豆，又称赤小豆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说，“赤小豆小而赤色”，能“治有形之病”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也说：“能下水肿，排痈，脓血”。

千百年来，相沿成俗，制作腊八粥的原料也越来越丰富，甚至还加入各种果脯。清末，慈禧太后御厨萧代在“七宝粥”和“八宝粥”的基础上，创制出荆州经典传统名菜“御膳散烩八宝饭”，其色泽光亮，油而不腻，甜而不厌。也许，正是因为八宝饭里加入了足够分量的猪油，在注重健康饮食和养生的今天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
“残腊多风雪，荆人重岁时。”宋代文学家苏轼的《荆州十首》诗中，就有他在荆州观看了逐疫傩仪后写下的诗句。一句“爆竹惊怜鬼，驱傩逐小儿”告诉我们，腊月初八在荆州不仅仅只是喝腊八粥，最为重要的还是要用腊祭去逐疫。据《荆楚岁时记》记载：“十二月八日为腊月。谚语：‘腊鼓鸣，春草生。’村人并击细腰鼓，戴胡头，乃作金刚力士以逐疫。”傩，是古代腊月驱逐疫鬼的仪式。《礼记》中说，“傩，人所以逐疫鬼也。”文献资料显示，腊月初八逐疫，源于古代的傩。商周至战国时期，在腊月里有一系列傩仪，以便驱疫。《楚国风俗志》中说：“后世楚地人民传承的这股舞傩风始于战国。”在民间，人们在腊月初八燃放着鞭炮，戴着大头假面具，举着桃木弓箭和各式各样的笤帚，击打着“细腰鼓”，跳着驱逐疫鬼的舞傩。据说，现在人们于岁末“扫阳尘”、放鞭炮的习俗，都是古代驱疫的演变。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”元旦和腊八节一过，新春佳节马上就要到了。正所谓，“春在千门万户中”，此时的荆州，城市里弥漫着腊月那独特的腊香味，大街小巷里随处可见大红灯笼高高挂，而在古城城墙上，蜡梅在寅宾门的两边，早早就挂上由著名联家吴绪松先生撰写的龙年春联：

波荡九龙渊，曙色纷呈梅绽蕾；
春来三楚地，东风劲拂凤飞天。



二十四节气邮票之小寒

□ 赵楚辉

“小寒”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23个节气，是冬季中的第五个节气，标志着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。

画家采用中国画的传统工笔勾勒画法。用黑色准确地勾画出孩子们不怕天寒地冻，在冰上滑冰的情景。画面简洁，色彩丰富，人物传神。

文史杂谈

『明辨体制』与『不拘格套』是否牴牾？

——浅读袁伯修《刻文章辨体序》

□ 汪业盛

荆州市三袁文化协会的王福学主席极力推荐袁伯修《刻文章辨体序》一文，嘱我读后谈点个人看法，遂暂抛俗事，取出张小萍女史前些时赠我的古籍善本《白苏斋类集》，找到了这篇文章。

《刻文章辨体序》是袁伯修为刻印明初吴讷《文章辨体》一书所作的序跋。吴讷是永乐年间的太医，后来曾做过监察御史、右佥都御史、左副都御史等职官，其一生谨慎廉直、刚正不阿，死后朝廷赠给他的谥号为“文恪”，这一“恪”字概括了其一生。我记得曾在万历年间蒋一葵所撰的《尧山堂外纪》中读到过有关吴讷的两则逸事，一则是其任监察御史时，到贵州巡察返回，当地官员赠黄金百两，其严辞拒收，但贵州官员让人带着箱子一路追到夔州，吴讷遂在箱封上题诗：“萧萧行李向东还，要过前途最险滩。若有贼私并土物，任教沉在碧波间。”另一则是其任都御史时，大理寺少卿杨复，在京甚贫，于是在家养了一头猪，每天让童子到玄武湖边采萍藻为食，可是吴讷却以其不合体制拒之，杨复遂戏作小诗赠吴：“太平堤下后湖边，不是君家祖上田。数点浮萍容不得，如何肚里好撑船！”从这两则故事中可见，吴讷其人，为官为事为人，无不“恪守体制”，有时甚至有点不近人情。其为文也是如此，所编《文章辨体》一书，始终贯彻了“文章以体制为先”这一观点。

袁伯修是晚明时期“公安三袁”之一，他们提出了“独抒性灵、不拘格套”的“性灵说”。“格套”者，犹“体制”也。提倡“不拘格套”的袁伯修为何要为“恪守体制”的吴讷所编的《文章辨体》作序呢？我正是带着这一问题来进行阅读的。

袁伯修在开篇即用类比法说明了“文章辨体”的重要意义。正如工匠做房子，先要分清庙、寝、堂的区别，否则，东家让你做寝室，你却修成了庙宇，那估计人家要把你扫地出门了。文章也同此理，先要清楚你所要写的是“诗类”还是“书类”，否则就会不伦不类。此外，工匠不仅要清楚庙、寝、堂、观等大类之异，还要知道桷、榱、节、梲等小类之别，“不得匠意而运”；而文人不仅要清楚“诗”“书”之源流，还要辨析“诗类”中骚、赋、乐府、歌行、近体，“书类”中诏、檄、牋、疏、状、志等体制，不得率性而为。譬如说，同为歌行，有的叫“篇”，有的叫“辞”，有的叫“歌”，有的叫“行”，如《白马篇》《归去来兮辞》《琵琶行》《箜篌引》《白头吟》《圆圆曲》《长恨歌》《长安谣》《楚妃叹》《玉阶怨》，这些都是有细微之分的，《文章辨体》中即有详细说明，“本其命篇之义曰篇，因其立辞之义曰辞，体如行书曰行，述事本末曰引，悲如蛩螿曰吟，委曲尽情曰曲，放情长言曰歌，言通俚俗曰谣，感而发言曰叹，愤而不怒曰怨。”不辨小细微，会闹大笑话。

“公安三袁”旗帜鲜明地反对李梦阳、李攀龙、王世贞等“前后七子”的复古之风，所以在阐明“文章辨体”的重要意义之后，袁伯修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观点。

“胡宽营新丰，至鸡犬各适其家，而终非真新丰也。优人效孙叔敖，抵掌惊楚王，而终非真叔敖也。”这段话并不是无的放矢，当时“后七子”的领袖李攀龙提倡“拟古”，其《拟古乐府序》中言：“胡宽营新丰，士女老幼相携路首，各知其室；放犬羊鸡鹜于通途，亦兢识其家。此善用其拟者也。”而袁伯修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即使再“善拟”，其终“非真”也。

与三袁大约同时代的吴门印派的沈野在《印谈》中也有类似论述，“诗自晋以降，不能复汉，自晚唐以降，不能复开元、天宝。至于我朝，汉魏盛唐，一时各臻其盛。然往往似优孟之学孙叔敖也，非真叔敖也。哪吒太子剔骨还父，折肉还母，真哪吒太子自在也，又何必用衣冠、言动相类哉？我朝崆峒之古调歌，弇州之古乐府五言古，沧溟之七言近体，乃其真者，余耳目所亲接。交游中亦不乏其人焉，然不敢擅论及之，海内自有公评。印章自六朝以降，不能复汉晋，至《集古印谱》一出，天下争为汉晋印，其优孟乎？其真孙叔敖、哪吒太子乎 ？”这里的“崆峒”指“前七子”领袖李梦阳，弇州、沧溟分别指“后七子”领袖王世贞、李攀龙，三人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，拟古拟得可以假乱真，但不过也只是“优孟衣冠”。

对此，袁伯修提出，不能“抱形似而失真境，泥皮相而遗神情”，而应“绍明作者之意，修古人之体，而务自发其精神，勿离勿合，亦近亦远”“深于文体，而亦雅不悖辑者本旨”。巧合的是，吴门沈野《印谈》也提出了相似观点，我建议袁伯修《刻文章辨体序》与沈野《印谈》两文可相互对照来读。沈野说，“刻古人未尝刻之字，全在处置得宜，刻古人未尝刻之刀法，全在心得之妙，谓之不离不合，又谓之即离即合”“至离而合、合而离，则又难为俗人言也”“出之天然，不用人力”“用尽神通，不及自然之妙”“眼前光景口头语，便是诗人绝妙词”。

读到这里，我对最初心中的疑问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：袁伯修反对“拟古”，但不反对学古，赞同明辨体制，但不赞同泥于皮相，如何让“明辨体制”与“不拘格套”相统一，就在于“勿离勿合，亦近亦远”，其旨则在“发其精神”。“精神”者，“性灵”也，而“性灵”之要，在一“真”字！

几年前，我曾应邀在张黄小学为江陵县诗词名家工作室的老师们讲课，当时写了一首《论诗》，自觉已窥得“性灵”之一斑，录于此作为结尾：

墨雨寒烟皆所宜，天工更比画工奇。
自从悟得归真法，敢把平常写入诗。